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0/2 (总第十一期)

- 倪世雄 赵曙光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六十年
- Thomas Fingar 2010年美国《核态势评估》之中国视角
- 卢 林 从美国个人消费信用的政治和商业动力看宏观金融风险管理
- 徐海燕 奥巴马能源新政解析与中国低碳经济之路的选择
- 张家栋 美国反恐政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张纯厚 围绕医疗改革的美国政治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争
- 汪晓风 美国互联网外交：缘起、特点及影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世界知识出版社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0/2 (总第十一期)

- 倪世雄 赵曙光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六十年
- Thomas Fingar 2010年美国《核态势评估》之中国视角
- 卢林 从美国个人消费信用的政治和商业动力看宏观金融风险管理
- 徐海燕 奥巴马能源新政解析与中国低碳经济之路的选择
- 张家栋 美国反恐政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 张纯厚 围绕医疗改革的美国政治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争
- 汪晓风 美国互联网外交：缘起、特点及影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 11 / 沈丁立主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012 - 4042 - 5

I. ①美… II. ①沈…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2681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封面设计 嘉 维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美国问题研究 (总第 11 期)
Meiguo Wenti Yanjiu
主 编 沈丁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毫米 1/16 13½ 印张
字 数 22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3 月第一版 2011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4042 - 5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特约文章

-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1 倪世雄 赵曙光
2010 年美国《核态势评估》之中国视角：
略为进步，隐忧重重/16 Thomas Fingar
从美国个人消费信用的政治和商业动力
看宏观金融风险管理/36 卢 林

专题文章

- 奥巴马能源新政解析与中国低碳经济之路的选择/57 徐海燕
美国反恐政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71 张家栋
围绕医疗改革的美国政治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争
——两党旗帜之下的贫富和意识形态对立/89 张纯厚
美国互联网外交：缘起、特点及影响/107 汪晓风

青年论坛

- 美国东亚政策的实用主义外交哲学解读/129 贾春阳
相互借重：冷战后美澳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144 李家成

学术评论

- 评《共同走过的日子——美中交往 200 年》/164 John Israel

学术交流

- 争论中的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
——第 10 届“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与全球治理对话”
会议综述/174 蔡翠红

特约文章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倪世雄 赵曙光^①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是中美关系从尖锐对抗到竞争合作的 60 年。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结构是决定中美关系发展的核心线索。其中，基于力量对比结构基础上的战略利益互动是决定性因素，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实力外交竞争关系状态，直接受到国际格局的决定性影响。此外，制度性结构和观念性结构构成了左右中美关系的深层变量。从制度性结构互动来看，中美关系属于不同制度模式的外交竞争关系，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从观念性结构互动来看，中美关系属于不同文化系统的外交竞争关系，受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受到上述多重复杂结构因素的影响，使得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依旧是充满着竞争与合作。结论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受结构性互动的制约，中美关系将继续保持合作与竞争复杂交织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结构性互动 力量性结构 制度性结构
观念性结构 中美关系

^①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赵曙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尖锐对抗到竞争合作的 60 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经验表明，对两国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正确认清目前中美外交关系的客观结构，并正确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发展趋势，进而确定一个合适的建设目标，中美关系才能做到充分利用资源和有效地解决问题，推动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反之，对两国关系的任何过高和过低估计都会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然而，要想给中美关系 60 年的历史一个准确的定位却十分困难，一方面，中美关系本身十分复杂，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众多维度，合作、竞争甚至冲突的层面都在同时发展，很难简单地用“朋友”、“伙伴”、“敌手”等传统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两国的基本国情悬殊，社会理想迥异，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处理突发事件的态度以及彼此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都迥然不同，各自按照行为逻辑和习惯运转，很难对两者的基本关系做出一个明确的判定。学者们在界定中美双边外交关系的时候，或者倾向于从利益层面，或者倾向于利益层面考察中美关系，要么把中美关系界定得过于乐观，要么把中美关系看得过于悲观。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美相互依赖的深入，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不能仅仅从“国家与国家”（state vs. state）的层面观察，还必须考虑“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vs. civil society）以及市民社会和国家（civil society vs. state）的互动等众多层面来分析。从此种复杂的视角透视中美关系 60 年，意味着双边关系已经不再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领地”，广大的社会力量、两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也被卷入中美关系过程之中，中美关系成为人人都可以施加影响的国际政治方程。诚如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所言，“以往的中美关系研究过于集中于最紧迫的政策问题和高层官方关系”，“这些研究是有用的，但是其他的研究将更有价值”。^① 在哈丁看来，除了两国外交互动之外，社会领域、公共舆论和经贸文化交流也是十分

^① Hary Harding, "An Agenda for Research on U. S. -China Relations," 转引自 CAS and PISA ed., *New Perspective on U. S. -China Relation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Shanghai, 2002)。

重要的视角。从这样的复合结构视角，中美关系的 60 年贯穿着一条结构性互动的主线。

一、国际格局决定中美关系的方向

国际格局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国际格局的运动中隐藏着双边关系发展的根本秘密。国际结构直接决定着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空间，也直接决定着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走向。

在美苏两极结构下，中美关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结盟，要么对抗。冷战爆发后，整个国际结构陷入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极对抗之中，后来演变成为美苏对抗和东西方对抗。此时的中美关系和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建立在两极对抗基础之上的。在建国之前，中国曾试图邀请停留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北上，希望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最终司徒雷登走了，美国关闭了承认中国的大门，中国只能选择“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美国积极组织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权力的争夺和意识形态的鼓噪相互激发，糅合在一起转变成为满腔怒火和斗争的仇恨，更由于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性质属于“战略性对抗”。此时，无论中美双方怎样希望改进双边关系，都受到整个国际结构的两极体制约束而不得前进，作为标志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注定旷日持久，无所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末之后，美苏对抗出现了新的转机。美国由于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导致国力相对削弱，国际地位下降。苏联则通过实施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全面扩充军事力量的计划，终于在 60 年代末改变了美国独占核优势的局面，国际结构从“美攻苏守”开始转向“苏攻美守”。^① 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政策对美国和中国的安全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美国来说，苏联是通过与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与美国争夺世界，并对之形成威胁；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60—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4—164 页。

对中国,苏联是通过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搞反华包围圈等形式造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①此时,美国向中国伸出了缓和的橄榄枝,从康隆报告到尼克松的关岛演说,对主要威胁的共识、对付主要威胁的共同利益等推动了尼克松访华和“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形成了70年代到80年代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也注定了当时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合作”性质,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蜜月期”在本质上属于中美合作应对苏联威胁的产物。

在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结构下,中美关系将陷入非敌非友的徘徊。冷战结束后,中美共同的外部威胁消失,美国成为“孤独的霸主”,^②中国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对手,^③中美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又是当前国际体系的霸权国,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这是最根本的差异,也是两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因此,中国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尽快地发展本国的经济,提高综合国力;而美国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地位,积极遏制挑战国^④。这种分歧使两国产生误解和分歧不可避免。^⑤因此,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潜在超级大国”(potential superpower),中美之间埋藏着冲突的诱因。不管中国政府多么开诚布公,都会引起美国的警惕甚至误解。因为从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看,两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是当今

① 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9, pp. 35-39.

③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④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霸权理论分析中,秦亚青教授通过论证和数据材料认为,霸权国往往会把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国际体系的维持看做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有了挑战国和潜在挑战国,霸权国家就会积极进行干预或者遏制。

⑤ 当然,分歧也有回旋余地,那就是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国内发展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如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产品市场等等。但是这一点当然也会受到传统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批评,维持两国理解的基础同样是脆弱的。参见 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136-160。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国际社会“一超多强”结构内在矛盾最集中的反映，由此决定了两国之间矛盾的一面是不可回避的，这种矛盾也不是仅凭政府之间的交往和协调能够解决，这是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逻辑（“安全困境”）所推演出来的必然结论。^①

从力量性互动的视角来看，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中美关系在 21 世纪的基本面肯定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两国存在差异和分歧是毫无疑问的，矛盾和分歧始终会存在的。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全面实现现代化。江泽民同志在建党 8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三大任务，^②实际上是三个最高的国家利益，中国必然追求发展壮大。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实力的增强必然对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形成挑战。虽然不一定导致冲突，但是肯定引起美国的警觉。^③ 因此，中美关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矛盾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在许多问题上也不能完全不考虑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毕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在地区稳定、不扩散、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

可见，从国际格局来看，中美关系今后将长期处于不对等的实力竞争合作关系中。所谓不对等，是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还是不能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和冲突；同时，这种不对等却不是完全“一边倒”的“不平等”和“依赖”关系，两国在“不对等”中还存在着竞争。近年来，所谓的“中美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美是 G2”、“中美是全球性的战略合作伙伴”

① 承认中美关系矛盾的一面不可回避，并不意味着两国一定会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利益矛盾其实是现实国际政治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在利益问题上存在矛盾的自然常态而已，很难将其作为中国威胁美国或者美国在威胁中国的理论依据，“中国威胁论”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将这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看做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决定性矛盾，将其极端地发展了。

② 即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参见《人民日报》2001 年 7 月 2 日新华社电。

③ 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在美国一大批保守人士那里形成了气候。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 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p. 5-10.

等说法都不过是此种不对等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表现而已。

二、政治制度左右中美关系的偏向

国际政治理论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提出了国家体制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从国家体制的缺陷可以发现国际冲突的一个原因。^① 沃尔兹看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缺陷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从国家体制来看，中美分属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制度差异经常令两国内部政治斗争殃及双边关系，从而在国际格局所决定的中美战略利益大方向基本稳定的同时，使中美关系不时偏离发展轨道。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1949 年以来的新中国在政治上属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制度优势的竞争张力。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尽管从历史地位上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但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而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属于最发达的阶段。中美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处于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两种政治制度之间制度优越性的竞争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制度竞争的张力，大大阻碍了两国之间建立政治互信和外交沟通机制的进程。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期望人口高达 13 亿的中国能够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人民通过鸦片战争以来饱经屈辱和苦难的历史，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得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论，因此对自己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选择的道路坚信不移，不可能如此轻率地冒着不确定的危险听从美国人提出的所谓“民主经验”，尤其是每当美国在一些问题上态度蛮横，指手画脚的时候，中国更是难以接受。因此，在政治制度上美国对中国接受其制度模式的期待和中国对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选择的坚持，是我们透视百年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的关键。

不少人认为，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美两国经贸交

① [美] 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和战争》（倪世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流和社会交往的深入，经济互赖性（economic interdependence）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①。实际上，经贸交流和社会交往对两个国家来说，带来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样多，因为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接触的面越广，其所引发冲突的频率可能更高，一个国家的企业可能因为利益问题对政府施加正面的影响，也可能因为利益问题挑起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一切经济冲突最终都会诉诸政治冲突，所有的一切纠纷最终需要政治体制出面干预进行化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惠国待遇问题、PNTR 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一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只要在政治制度上没有形成默契，皆可转化为对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政治制度和特别是外交体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默契程度，决定了两国关系抗御风浪的能力，即使不存在国际结构方面的压力，冲突的根源仅仅来自两国交往的“低级政治”层面，也能够按照外交途径予以化解。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不是取决于两国冲突产生的严重程度和广泛程度，而是取决于两国政治制度联合化解冲突的能力。因此，中美两国如何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交往磨合”，如何能够通过外交努力建立起防御各种风险的“制度堤坝”，是我们分析中美关系发展水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美经济和社会交往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长期生活在美国式民主政治制度之下的美国人还是看不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认为中国的制度是类似于法西斯的独裁政权；虽然“中国制造”遍及美国，但大部分美国人心中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荒蛮之地，饱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控制，人们没有信仰自由，妇女要缠足，知识产权没有保障，外国人没有安全感，盗窃美国核机密，一胎化限制，出口导弹，威胁台湾……所有这一切，和中国对美国普遍的正面评价与介绍，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为看不惯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许多美国人始终期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国式的民

^① 潘忠岐：《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过去、现在与未来》，《国际观察》2002 年第 3 期；楚树龙：《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郝雨凡：《无形的手》，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

主政治制度。这种“传教士情结”自从18世纪就一直存在，延续至今。美国政要一直声称：民主、人权是中美关系和美对华战略的重要内容，甚至是美对华外交和两国关系的“中心内容”。他们毫不掩饰在美国对华战略、对华外交中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原则和标准，推行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接触战略”的内容和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中国的变革，和平演变中国，使中国成为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的一员，即尊重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标准，受西方创立和主导的《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等政治、民主、人权体系的约束。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表示：“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如果我们希望促进那里实现和平演变的话。”^①在改变中国方面，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舆论界人士则说得更加露骨。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电视节目中说，美国应当帮助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府。^②对此，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指出，“美国人仍然深深渗透着一种长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对美国人来说，这个问题看来绝不是要不要改变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中国的问题……”^③

美国政府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期望中国能够接受美国的制度模式”，不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还通过各种行动，努力推动中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参议院层通过修正案，要求布什政府务必使中国领导人知道，“除非他们承认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人权和正义的合法愿望，否则我们两国关系将继续保持紧张”。^④美国的这种行为，在扮演所谓“国际道义牧师”的同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却赫然成为“我行我素的帝国主义行径”，加深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和厌恶。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中国社会内部也开始涌动对美国的抵触和反对情绪。本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国内曾一度有一批知识分子对

① 美联社华盛顿，1994年5月29日。

② 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31 July, 1995.

③ David Shamba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97).

④ 刘连第主编：《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美国的政治制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令中国政府和民众大为反感，从“银河号事件”到允许李登辉访美，再到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和厌恶达到高潮。从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到对待中国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中国人民开始感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无限美好。随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各项改革日新月异，“中国可以说”、“中国不高兴”^①等情绪逐渐在广大民众中间体现出来，中国完全可以不接受美国的所谓“民主、人权”，照样能够实现社会大踏步地前进。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自信地向世界宣告：“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選擇，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②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更加坚定，用词更加自信，明确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③

显然，尽管中国不像过去那样鄙视美国所谓的虚伪民主制度，指责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也绝不会完全照搬或者移植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从自己60年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奠定了自己对建设富强国家和美好未来的自信，中国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越来越成为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不可回避的竞争模式。

但是，美国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和指责。美国必定会凭借其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吹毛求疵，甚至通过支持“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以及“海外民运力量”，对中国进行牵制、批评和打压。中美之间在制度上的竞争必将继续持续下去。不过，美

①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12日。

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8日。

国也有不少人看到了美国这种做法的荒诞不经，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J·富布赖特就揭露说，“强权是一种麻醉品，一种麻醉性极强的东西，而美国现在却走上‘这条路’。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飘飘然地向上飞翔，愉快地把人力和物力作为礼品赠送出去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后，我们的人驾驶宇宙飞船降落在越南的沼泽之中，突然之间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在向上飞翔了，而是陷进了泥潭。”^① 历史将在不久的将来见证这一箴言。

三、文化差异影响中美关系的幅度

中美关系的生命力固然取决于两国在战略、政治、经济及其他领域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对对方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个国际行为者的认知和了解，也同样至关重要。历史证明，除了结构和利益上的原因，中美之间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相互误解（misperception）也是导致中美之间隔阂、敌对乃至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探讨中美之间的相互形象，知道对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对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深层次成因是大有帮助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不大重视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众对彼此之间的印象和观念认知问题。在现存的有关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绝大部分是有关政策和历史的研究，较少有系统地探讨中美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形象和认知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这一层面受到中美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例如美国学者沈大伟 1991 年出版的《美丽的帝国主义》（*Beautiful Imperialism*），中国学者杨玉圣 1996 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美国观》，张济顺 1999 年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 1943—1953》，旅美学者王建伟在 2000 年出版的《有限的对手：中美在后冷战时期的相互形象》等都开始从形象认知层面

① [美] 威廉·富布赖特：《踮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95—96 页。

② Wang Jianwei, *Limited Adversaries, Post-Cold War Sino-American Mutual Im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其实，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形象定位与两国关系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一批给美国人带去中国形象的是“传教士”和“商人”。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根据各自的经历和体会，对中国的形象作了五花八门的描绘，当这些见闻回到美国，生活在美国本土的人们便面对着一幅幅眼花缭乱、有时甚至是扑朔迷离的图景，美国人如何看中国长期处于“瞎子摸象”的状态之中。200多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几经周折，彼此的误会依然很多，“中美关系自1979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次出现了领导保持冷静而中国公众观点趋向激烈的现象”。^① 具体来说，许多美国人“要么把中国看做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只亚洲虎和可以给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的巨大源泉，要么把它视为世界上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是对自由和安全构成的下一个威胁”。^② 而在中国，众口一词的言论背后也同样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的反美情绪，特别是青年人中间，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充满了较为激烈的辩论。

两国彼此在形象定位和观念结构领域存在的落差，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左右着民众的认知，广大民众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双边关系，使得对中美关系深有研究的专家和外交官的冷静做法无法抵抗公共舆论的强大压力，从而大大限制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空间。一旦发生一些本来能够通过外交途径得到较好解决的意外事故，那些以顺应民意为主要执政准则的民选官员在这种强大的民意力量推动下，很容易作出过当的决定，进而火上浇油导致无法收拾。因此，如果双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观念的沟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中美关系不仅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而且有可能导致兵戎相见，最终酿成历史的悲剧。可见，在国家形象和观念结构的“隐形背景”也是分析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中美之间在国家形象和观念结构领域的磨合，最终反映着中美关系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① 孙哲主编：《美国国会研究》（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② [美] 托马斯·博克、丁伯成：《大洋彼岸的中国幻梦——美国“精英”的中国观》，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在美国,60年来制约中美关系的“躁动灵魂”主要表现为“天定命运”所决定的“道德十字军”的狂热。冷战之前,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处于一种传教的狂热,希望这个古老的文明能够很快转换过来,加入现代(西方)文明。代表这种狂热的最佳例子是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惠瑞(Kenneth Wherry)在1940年的一次讲话:“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把上海提高、提高、再提高,直到它达到堪萨斯城的水平。”^①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国内的躁动灵魂主要表现为“中国威胁论”,“即将到来的与中国的冲突”之类的论调流行于市,并不时体现在美国政府的政策日程之中。从总体来看,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黑暗的旧大陆”,有一个“黑暗的传说”。战后初期,由于冷战的影响,麦卡锡主义的鼓噪,美国人在认识中国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偏见。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就是“拿着红色语录本的红卫兵”,是一个“红色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取得圆满成功,邓小平亲吻美国少年儿童,戴着“牛仔帽”的友好形象连同大熊猫的可爱形象一道成为大多数美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标志”,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形象风云突变,所谓“追求民主中国青年孤身挡坦克”成为美国人认识中国挥之不去的形象,一些反华分子往往也是借此推波助澜,迷惑民心。上面谈到的三种“中国形象”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情况,它们构成了中美关系难以回避的“民意基础”,在这样的“民意基础”上,即使政治家们如何努力,都难逃脱其设定的运行轨道,只是偏离程度不同而已。比如冷战期间,尼克松和基辛格认识到了重新认识中国的重要性,认识到借重中国联合抗苏的价值,但是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决定了两国不能达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成熟程度,甚至直到1979年卡特政府促成了两国建交,美国国会还是随后抛出了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定时炸弹”——《与台湾关系法》。

不过,目前断言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反华力量还为时过早。

^①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

结构性互动：中美关系 60 年

观察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会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吵，人们很容易发现大多数国会议员并不了解中国事务，对中国问题也不关心。美国国会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凯利·丹博（Kelly Dumbaugh）认为，国会在对华政策上大致分为三派：有一些议员总是喜欢提出反对中国的议案，他们深信，中国的政治体系不改换，中美关系绝对不能向前发展。如果中国囚禁了什么人，对外出售了核技术，便有一小撮人就此拼命地提出议案。这些个别人大概只占国会议员总数的 10%~15%。另有 30% 左右的议员对中国较为友好，持与中国接触的态度。他们加入这一组也许因为他们同意亨利·基辛格等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士的思考模式，愿意用更广阔的战略框架看待中美关系；也许因为他们代表某些特殊的利益团体如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希望能够向中国出售农产品；或提倡自由贸易主义的团体，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基于这些因素，他们认为“对华接触政策”非常可取。国会中还有第三类人，他们没有明确的倾向性，根据不同的情况或不同的政策问题来决定如何投票，这类议员较容易被前两类议员所说服，有时在某项对华政策的投票中投反对票，有时又投赞成票。^① 政府官员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正是由于缺少了民众监督这个有力的“紧箍咒”，才使得一些对中国抱有偏见的政客或者存心不良的人有了从中渔利的空间。如何抓住美国“民意基础”这个有力工具，是今后取得对美外交突破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这种躁动的灵魂主要表现为“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观点和“中国可以说不”的呼吁。前者主要存在于冷战结束之前，并一直持续至今，在一些比较年长的民众之中比较有市场；^② 后者则主要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广泛存在于青年人中间，认为美国在世界上过于霸道，对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内部事务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并进行了粗暴的

^① 转引自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9 页。

^② 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8—243 页。